2010美國參訪紀行（二）

旅美作家、學者

文・攝影／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

2010年的美國之行，除了參觀東岸素負盛名的圖書館等相關研究機構，另一則重頭戲，是拜會長期旅居海外的台灣作家與學者；藉此，一方面介紹本館在台灣文學的研究、文物典藏與教育推廣等各方面的成績，使其對文學館有更深入的認識，同時，也帶回作家們的近況，與國內讀者分享。由於篇幅所限，作家學者之訪談紀要將分於兩期刊載。

愛荷華深秋了，拜訪聶華苓

此行的第一站，是位居美國中部的小鎮愛荷華，這裡不僅有知名的愛荷華州立大學，還住著一位與這所大學淵源頗深的台灣女作家——聶華苓。

1925年出生於漢口的聶華苓，畢業於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父親早逝，她身為家中長女，在1949年帶著母親與弟妹來到台灣，也肩負起照料一大家子的責任。1949年11月底，由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因緣際會之下，聶華苓參與了這份刊物，最初負責文稿，後來受到雷震的賞識，不但擔任「文藝欄」主編，更加入編輯委員會；與此同時，她也開始進行文學創作，除了散文和短篇小說，極具自傳色彩的長篇故事《失去的金鈴子》，以一個叫做「苓子」的小女孩的成長為主軸，亦備受矚目。五〇年代的台灣文壇，是（外省）女作家大行其道的黃金時期；然而，聶華苓與林海音一樣，除了是一位「作家」之外，她們身為重要報刊的「女編輯」，在洶湧的反共文藝、戰鬥文藝的浪潮中，為台灣文學開鑿出別有洞天的淨土，是今日回顧那段歲月時所不能忽略的。聶華苓曾說，在《自由中國》的編輯會議上，聆聽保守派和開明派的思維與論辯，以及在雷震、殷海光等人身上所看到的嶙峋風骨和做人的尊嚴，對她一生影響至為深遠——在主編《自由中國》「文藝欄」期間，她以絕對的勇氣，將「文學」作為選文的唯一標準，嚴正拒絕那些政令宣導、反共文藝、八股文章……，就是一個最鮮明的例證。

1991年逝世的詩人保羅・安格爾，始終活在聶華苓心中。

時光荏苒，當年的小苓子，而今已高齡85歲了。

1960年，「雷震案」爆發，《自由中國》停刊，聶華苓雖然未受牢獄之災，仍不免經歷特務監視等白色恐怖的心理壓力。1963年，她結識了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遂前往美國擔任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顧問，1967年更和保羅・安格爾一同創辦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IWP），每年挑選、邀請優秀作家到愛荷華訪問交流數月，擔任愛荷華大學駐校作家，寫作、討論、朗讀、旅行，40多年來已有1200多人參與。台灣方面則有包括楊逵、柏楊、張香華、鄭愁予、七等生、陳映真、林懷民、高信疆、蔣勳、張大春、駱以軍等數十位作家受邀前往。對台灣文壇來說，這個由聶華苓一手催生的國際寫作計畫最重要的意義在於，透過她的戮力推動，不僅促使台灣文學與世界文學接軌，同時也開啟了兩岸三地作家在海外交流的先河，對台灣文學能見度與知名度的提升實在功不可沒。

從紅色階梯拾級而上，就是聶華苓的「安寓」。

10月19日一早，在紐文中心徐水仙主任與邱旭伶小姐陪同下，我們抵達了愛荷華大學附近、聶華苓與保羅・安格爾結褵後定居的府邸；順著小徑而下，大路一旁佇立著許多參與「國際寫作計畫」的台灣作家都曾經短暫居留的「五月花」公寓（May Flower），屋後廣袤的林間坡地即為聶華苓筆下著名的「鹿園」。迎著「安寓」的門牌，我們帶著滿懷的緊張與興奮之情按下電鈴；片刻之後，一個健朗的身影出現在眼前，耳邊也隨之響起洪亮的「歡迎」聲——時光倏忽，怎麼也很難想像，當年那個走在三星寨路上的「苓子」，而今已然是一位高齡85歲的老婦人了。

一見到聶華苓，總不免要從她居功厥偉的「國際寫作計畫」開始聊起；由於年事已高，目前算是退居「幕後」，不過倒也不是完全的無事一身輕，她以「藕斷絲連」來形容其與IWP的關係：「他們都還是對我很尊重、很好，幾乎到這裡來的華文作家都還是由我推薦的。」回憶起當年，「台灣最早來的是余光中，那時候我還沒有來」；與她同年抵達愛荷華的則有白先勇、王文興、葉珊（楊牧）、陳少聰……等，「我們那時候常常在一起啊，吃喝、玩笑、唱歌，很熱鬧。」後來，作家們都離開了，聶華苓卻留了下來，也把兩個女兒從台灣帶來，一晃眼，「好多年了，我剛來的時候都不知道我會留這麼久。」

翻開北京三聯出版社出版的《三生影像》，裡頭284張照片，幾乎已經訴說了她的一生。翻著翻著，她最為感念的，顯然仍是七、八〇年代台灣作家在此歡聚的盛況：1970年還沒創辦雲門舞集時寫小說的林懷民、跳舞的柏楊、經常踩著拖鞋端著一鍋紅燒肉從山腳下的「五月花」迤邐而來的陳映真……，開朗而熱情的保羅・安格爾和聶華苓的家中客廳，是作家們最喜歡賴著的地方，「尤其是大陸作家，也特別喜歡來。」

說到底，她最關心的，還是當前台灣文學的發展以及政府公部門對於文學創作挹注資源不足的問題。經過多年的耕耘，IWP已經是世界有名的文學組織，許多國家都由文化機構出資贊助作家前來進行文學和文化的交流與推廣。聶華苓特別指出，像中國大陸與韓國政府，近年來便投入豐沛的資源拓展國際文學交流，各項獎勵補助不遺餘力，但台灣作家卻經常因為苦無經費而無法成為IWP的邀請對象，「我很希望台灣有人來參加啊，因為這就代表台灣嘛，不然『台灣』就越來越沒有人知道了。」由於在場有文建會徐主任等人，因此她特別叮囑，希望未來在相關政策的研議和政府預算方面，文建會可以為作家們做得更多，不要讓台灣文學與作家處於無米之炊的窘境。

雖然身體健朗、精神矍鑠，但一位老人家獨自住在這樣一所大房子裡，還是讓人忍不住關切其日常生活的照料和打理。聶華苓不改其爽朗本色說：「我的日常生活很簡單的，這裡周圍都是樹，環境很乾淨，所以沒什麼灰塵，就請人每個禮拜來打掃一次；吃飯的話，多半是跟朋友相約出去用餐，我自己是幾乎不作飯的，更簡單。」此外，她依然維持著固定寫作的習慣，甚且老早開始用電腦打字代替手寫；出門自己開車、冬天時自己鏟雪，訪友、購物……，晚年生活十分精采。唯一令我們忍俊不住的，是她說到自己雖然會開車卻沒什麼方向感，「我總是記不住路名和方向」，所以，以前每逢保羅．安格爾問她：「妳是怎麼到愛荷華的？」她總是俏皮地回答：「因為我走錯了路啊！」

閒談之間，聶華苓起身帶我們裡裡外外地參觀了一遍；家中觸目所及，都是她與保羅．安格爾的精心收藏，由於兩個人同是中華文化的愛好者，因此滿是許多古色古香的文物，讓整個空間充盈著有如博物館一般的古典之美。由於時間有限，僅能稍作停留；臨行前，她還發揮老當益壯的本領，親自開車載我們繞行愛荷華大學校區與附近的社區公園，秋光中的愛荷華，一切靜好；在此居住了三、四十年的聶華苓，每到一處，總不忘訴說那裡所埋藏的她的回憶，透過其動人的敘述，我們得以短暫卻深刻地領略她與保羅・安格爾的深情。

哈佛大學校園，與王德威晤談

行色匆匆地告別愛荷華之後，又是另一段漫長的飛翔，在暮色中抵達美麗的大學城Boston，寒風瑟瑟，很有些初冬的氣息。20日上午，先是參觀著名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下午2點，同一棟古老建築裡，我們走進在此任教的重量級學者王德威教授的辦公室。

在台灣文學乃至華文文學的研究領域，大概很少人沒聽過「王德威」這名字；台大外文系畢業後，他負笈美國，取得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比較文學博士，短暫回台擔任台大外文系副教授，隨後便陸續任教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化學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學系；目前則是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除了學院工作以外，他同時也是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文化及制度史中心主任、並於2004年獲選為中研院院士。王德威學術生涯的起點是從「晚清小說」開始，一路擴展延伸至中國三〇年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台灣文學、乃至華文文學；雖然長期置身海外，但他對於台灣文學的關注、研究始終未曾中斷，不僅勤於著書立說，建構台灣文學史架構，更長期與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合作，致力於將台灣文學翻譯、推廣至美國的閱讀市場。此次拜會就是由於他對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翻譯和出版現況，有相當程度的熟悉和了解，因而前來請益。

文學館在2011年承辦了過去由文建會主持的「中書外譯計畫」（現更名為「台灣文學翻譯出版計畫」），希望藉此能將更多優秀的台灣作家與作品推向國際。從理想上來說，這絕對是台灣文學館責無旁貸的任務，但從現實面來看，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必然會遭遇不少難題，該如何克服？或者，該如何讓困難減到最低？聽了我們的提問之後，王德威從他自身的經驗出發，表達了幾點觀察和意見。

華文文學在過去，確實已有不少翻譯作品，而且也有其一定市場，不過若要以此論斷其「影響力」，不免就有些言過其實，王德威表示，這主要跟美國人的閱讀習慣有關，「10個美國人裡面大概有9到9個半是不讀翻譯作品的，就算是諾貝爾得獎作品，他們也不見得有興趣。」所以如果要

談到了與台灣文學有關的話題，王德威懇切而誠懇地提供了諸多寶貴的意見。

在美國市場推動「中書外譯」，不免存在著幾個先天的難題，例如，出版社的意願與興趣，其次則是翻譯人才的尋找——許多專業譯者所需支付的稿酬，實際上是我們無法想像的天價，但是，「翻譯到最後，並不是原作者有多偉大，而是翻譯者能否將原作者的偉大傳達給另外一個語境裡的讀者，這樣好的譯者是可遇不可求的。」他也說到，當然我們也可以尋求台灣本地的譯者，不過那又是另一個問題。——如何找到一個以英文為母語，又能對中文有絕對感性的譯者，再加上能憑其名號而有好的出版者和好的銷售成績，這幾個問題需要連結在一起被考慮，不過，一旦觸及「經費」，就必然會受限於國家法令，特別是嚴格的會計制度，讓他在過去幾次的相關過程中感到有些氣餒。因此他認為，只要譯者的稿費制度不解決，要完全達到規劃初期的理想便很不容易；為了不要浪費力氣，他的建議是，不妨將各方資源統合在一起，無論是官方單位或民間機構，站在相互合作的立場，將會更有利。他以過去蔣經國基金會曾與文建會合作的經驗為例，說明若與類似熟悉國外相關事務的機構合作，往往可以避免因行政程序的繁瑣複雜而造成執行上的諸多困難和不便。

當然，回歸一切事物的起點，最終要問的還是：台灣究竟有哪些好作品值得推介給國外讀者？如果對當地閱讀市場和品味不理解，只是用台灣的閱讀與評論觀點，結果往往事與願違，因為，「譯者會對作品有意見，出版社也有他們的考量。」作為一個中間人，王德威自承他並沒有任何先入為主的成見，但至少其專業是現代文學，也在美國教了很多年書，大概能夠掌握他們的興趣和品味。順著這樣的脈絡，他說，其實可以把這件事做得更活潑些，「比方說，我們要翻譯的，不見得一定要是傳統定義下的『文學』，跟歷史、文學史有關的文本，應該也可以嘗試看看。」

看清楚了無論是商業出版公司或學術出版公司，都同樣分食著版圖有限的華文市場，王德威特別強調，「我們不用覺得台灣比較小所以如何如何，不是那回事，而是這個市場本身的限制，

昔日怒目少年，猶在文學江湖闖蕩——王鼎鈞

在紐約的第三日中午，徐主任為了幫「國立臺灣文學館」打知名度，特別設宴款待，邀請我們和幾位在紐約華文圈的作家、文學工作者一同用餐；在此之前，我們先行拜會了人稱「鼎公」的王鼎鈞先生。

在Flushing棋盤格式的小社區裡，相同的路徑繞行多次，卻始終遍尋不著鼎公住處，打了好幾通電話之後，才總算「得其門而入」。

若說「我們從小是讀他的書長大的」，這句話大概對不少讀者都適用，以散文著稱的王鼎鈞，早年以『人生三書』——《開放的人生》、《人生試金石》、《我們現代人》奠定其文壇聲名，其中有些篇章還曾經收錄於教科書，是國文課的必讀教材。那時的我們既無法感受也難以想像，這位字裡行間湧動著積極向上正面能量的作家，年少時流離失根，來台後又遭受特務監視等政治上的磨難，早年的經歷在他心底磨蝕出一個難以填補的黑洞。終於，1978年，為了告別幾乎讓他無處安身立命的白色恐怖記憶與氛圍，加上考量子女的教育問題，他決心西渡、告別台灣。

「俱往已」，眼前這位有著典型山東人高大身形的白髮長者，在耗費17年寫下自己一生所走過的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在台歷練等四部自傳之後，對於世事已能雲淡風輕地看待。聊起這部書，他不談內容，只說想聽我們的意見，「我很需要知道像你們這樣年紀的人有什麼看法，因為這個書是寫給年輕人看的，寫我自己的一點點思考、一點點經驗，我很關心各位能不能接受。」回顧那段在險阻中求生的過去，他說，「這裡頭其實有很多僥倖，這也是為什麼我後來跟宗教很接近，因為很多事很難解釋，絕不是憑我們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克服的。」他雖然是一位基督徒，但從不諱言由於受到聖嚴法師的影響，對佛教懷抱深切的好感，也是靠著佛教教義中對於「圓滿究竟」的追求，才修補了在戰爭中被摧毀的人格與精神。

透過徐主任的介紹和師母的招待，可以明顯地感覺到，鼎公在此地最是一位德高望重、備受尊敬的前輩，雖然自嘲：「該有的毛病都有」，聽力也不那麼健全，但他其實從來沒閑著，除了持續不斷地寫作、閱讀，十多年來，更帶領許多有心以華文創作的文學愛好者一同讀書、賞析文學作品，為了稱述方便，索性以「九九讀書會」為名。根據師母的描述，每個星期一晚上，就會有各行各業的人士，慕鼎公之名前來，圍坐在不大的客廳裡，聽他解說所閱讀的文學作品，「他們都是想寫文章的人，而寫文章不外乎兩個問題，一個是寫什麼，一個是怎麼寫。我說寫什麼你們自己決定，怎麼寫我可以給點建議。」長期細心灌溉耕耘的結果，就是集結了20位讀書會成員精選作品、獲得「僑聯總會頒發華僑著述佳作獎」的《西風回聲》，這本書，可謂是在鼎公的指導下所交出的一張漂亮的文學成績單。

走過時代的風浪，王鼎鈞在言談之間，總是一派淡然，有著洞察世事的清明。

這裡就是鼎公在Flushing的居處。

右起：紐文中心徐水仙主任、本館同仁鄭蓮音、王鼎鈞、王夫人、本館同仁洪彩圓。

來美之後，起初也許是為了沉澱心情、擺脫肅殺沉重的過往，後來則是因為身體狀況不允許，三十多年來，他再沒有回到台灣，也未曾踏上中國大陸原鄉；儘管如此，他不但對台灣文壇瞭如指掌，言談之間更充滿了對故鄉的關切，透過電視新聞，得知台灣又遇颱風淹大水，他說：「看到這個新聞，我們都很憂慮，天災太多了，一開始，大家都是關心的，拼命捐錢；但是年年有災害，錢沒那麼多，愛也沒那麼多，不就冷淡了嗎！」聊起台灣文學時，他則一一點名幾位曾經閱讀或持續關注的作家，以簡單的幾句話，精要地發表他的見解；對於寫作，他最終的體悟仍然是：「好作品不能光靠資料堆砌，而是要深入生活，寫出切膚的感覺。」年輕時在報社服務，他說自己那時候就是「靠資料寫文章」，「因為我是『職業作家』，人家給我資料、出題目，我就寫，這究竟是行不通的。」值得一提的是，當我們說到作家姜貴的手稿文物都在文學館中典藏，他立刻回想起有一段時間曾經頗密集地與姜貴往來通信，這段故事也出現在他的回憶錄《文學江湖》中；鼎公幽默地回憶：「姜貴晚年很倒楣，我也很倒楣，我們兩個倒楣的人有時間，因為都沒人理嘛，所以經常聊天，他這個人談話很有意思，簡直就是個預言家。」聽來雖然有些辛酸，但這份文人相重的情誼，令人印象深刻。

大半生流亡飄零，自比為過著「逐水草而居」的日子，他怎麼看待眼下承平時代的年輕人？鼎公不改風趣本色地說：「有人說嘛，什麼叫『老了』，如果一個人看年輕人不順眼，就是老了。」那他自己呢？「我看年輕人沒有不順眼，只有憂慮」，他所看到的美國小孩，是「晚上出去買啤酒，路很近也要開車；情願多花一點錢也不願意到大賣場買東西，因為要排隊；很多時候沒事做就打電動玩具。」在他看來，「這樣的孩子怎麼承擔未來的苦難？」或許是因為曾經遭遇過那樣動盪離亂的時代，他對人生總是悲觀的，「不管是個人的小生命還是眾人的大歷史，好日子少、壞日子多」，而等在年輕人前方的未來不會總是好日子，那麼，「他們要怎麼活下去而不會發瘋、自殺、得憂鬱症？」說到這裡，耳邊響起了師母的催促聲，而他則留下一句耐人詢問的結論：「我這麼說並不是覺得受苦是應當的，只是，不可避免的。」

讓我們必須用一種平常心的態度來面對。」所以台灣現階段要做的就是穩扎穩打、公平競爭，「好好做我們覺得值得做的，不用想其他」，因為，「你只要好好做，這些東西就會留下來；即使過了三、五十年，它依然存在，不是嗎！」細數歷來臺灣文學在翻譯中所經歷的風雨波折之後，他不無感嘆地表示：「這中間漫長的過程，真的是不足為外人道，這裡沒有什麼所謂的『團隊』，就我一個人，基本上可以說是一種奉獻，因為這是額外的工作。但是我覺得既然在這裡有這樣的一個位置，只要是我能做的，我一定願意盡力。」

知道他是在百忙之中特別抽空跟我們會面，雖然仍意猶未盡，也不好意思打擾太久。因此，最後我們簡單地詢問了當前美國華文／台灣文學研究的現況，他以其所熟知的學術界生態，大致敘述了目前幾位專事台灣文學研究的學者名單及其領域專長。他同時也提及，現階段美國學術圈對華語電影最感興趣，因此教授華語現當代文學的老師幾乎不可能不談電影；換句話說，在美國，台灣電影的能見度恐怕還高於台灣文學，這是未來國內應該要密切觀察和注意的趨勢。至於對「國立台灣文學館」的建言與期望，他很謙虛地說因為長期不在台灣，所知有限；但還是以其一派溫和的態度表示，「我想很多事情做了就是『有』，會有成績留下來。文學館的經營不能只看眼前的這一兩年，因為這是長遠的事，尤其是這個館還很年輕，起碼要十年、二十年之後才能談累積性的成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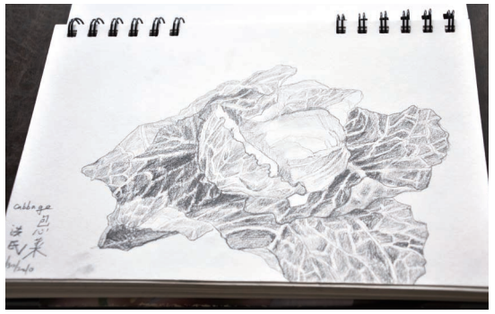
在生活中找故事的人——洪素麗

在繁忙的紐約街頭，路上車水馬龍、建築櫛比鱗次，長期旅居紐約的作家洪素麗，就住在這吵雜街腳的一隅，完全顛覆了我們閱讀其自然書寫篇章時的想像。

我們所知道的洪素麗，是散文家、是詩人，但是走進她的家，滿牆滿室的版畫、油畫作品，這才提醒了我們，原來她不僅是作家，同時也是藝術創作者。就如同詩人顏艾琳曾經這樣介紹的：「滔滔文學後浪推前浪，誰還記得有一台灣奇女子，會詩會散文會畫會刻會賞鳥？旅美三十多年的洪素麗，就是這位深愛大自然，但也喜歡融入都市文明的女子。侯鳥一樣的她，在美國與台灣的這條航線飛來飛去，以文字與圖畫紀錄了她的生命視野。」

談起她的創作歷程，洪素麗說，她從小就喜歡寫作、閱讀，而初三升高一的那年，隨著要報考美術系的三姊一同習畫，因而開啟了她另一個創作的機緣。「大學時原本唸哲學系，後來轉到中文系」，畢業時，周遭同學都繼續往深造之路走去，但她卻沒有做研究、當學者的念頭，只覺得自己的美術創作技巧還是不足，加上大姊一家人彼時正在美國，於是她就來了紐約，再度拜師學畫，這一待，就是三、四十年。

一邊煮水泡茶，一邊神采奕奕地介紹著她在紐約的生活；「紐約各式各樣活動很多的，不是藝術家之間的討論聚會，就是餐會啦什麼的」，但對於這些，她從來很少參加，我們到訪的那天晚上，一位版畫家要展示一種特殊的技巧，洪素麗同為畫家的先生準備赴約，但是她不打算出席，「因為我要看棒球賽」，天真的語氣，引來一陣喧鬧的笑聲。聽起來，她的生活幾乎完全被創作佔據，問她哪來這麼多時間？她說：「我想如果一個人真心想要做什麼，就一定可以撥出時間來。」對她來說，文學與美術並不衝突，她通常是在文字書寫一段時間、感到枯竭的時候，轉身拿起畫筆；而倘若筆下再也畫不出什麼東西了，則又再回頭寫作。怎麼定義自己呢？她覺得



（上）洪素麗的鉛筆素描作品。

（左）旅居紐約數十年的洪素麗，不僅知名於國內文壇，亦活躍於紐約藝術圈。

「畫家」與「作家」兩種身分並不衝突，既是畫家又是作家，是她天經地義的追求。

從小在高雄市區成長的洪素麗，詩作內容偏重於鄉土歷史、政治感傷及環保議題，散文則以自然主義為思考重點，尋求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平衡；近年來，她追求以文學之美散播自然生態的知識，並以詩及散文反映台灣的滄桑，企圖透過寄居海外的旅人鄉情，喚醒人們正視鄉土。由於文字中盡是山川草木與生態觀察，以至於到訪之前，我們總以為她是住在接近「大自然」的郊區，沒想到原來是「大隱於市」，「我從來沒住過鄉下，包括在台灣和在紐約時皆如此，之所以會寫出與大自然有關的作品，主要還是來自旅行的經驗。」不過這位資深的賞鳥人也說了，只要安排得宜且用心，「在城市裡也可以『看到』很多大自然」，她舉例說，曾經有鳥類生態觀察者做過研究紀錄，「紐約市一年內有200多種鳥類經過，而整個美國那麼大，也不過才400種鳥。」也許正是因為有著如此細膩的巧眼慧心，我們發現到，她的畫筆下，特別專注於描繪城市中各種各樣的「樹」，或寫意或抽象，不變的是在陽光照射下，樹叢中光影粼粼的燦爛姿態。

除了接近自然，洪素麗對「人」也充滿興趣，她喜歡透過生活中的接觸，聆聽人的故事；聽得多了，這些故事都成為她寫作的靈感。就如同作品《銀合歡》一書的隱喻，她以植物的漂流，象徵人群離散的身世，將背景設定在紐約，寫出來自四面八方的義大利裔、愛爾蘭裔後代、加拿大學生、波多黎各移民和芝加哥畫家的人生。談笑之間，她也是這般洋洋灑灑地讓一個又一個光怪陸離的生命場景上演——喜歡她的作品而前來看畫的波蘭女人，或是，同一棟公寓中的人權律師、來自南美洲的青少年門房……。

生活在現代文明大都會數十年，令人覺得有點不可思議的是，至今，洪素麗的書寫仍然停留在「手工藝時代」——她不太會用也不太愛用電腦，包括打字與收發email，所以與她連絡，除了電話，還是要透過越洋郵件，但也正因如此，她許多美麗而新穎的原創手稿，得以非常完整且豐富地保留下來，靜靜躺在滿是藝術品的家中角落。臨別前，她翻出了與詩文搭配的插圖畫作，一一解說——以鉛筆素描而成的「包心菜」，果然很有她的風格，讓人一看就懷想起充滿泥土氣息的家鄉味。